

評王靜，《中古都城建城傳說與政治文化》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248 頁

李丹婕*

徵應、符命、祥瑞等自然世界的顯現，在中國中古時代，特別是秦漢以來到北宋這段時期，常被視為反映皇帝與國家合法性的象徵。因史官詳細而系統的記錄，產生不少相關的史事記載和闡釋文本。根據王靜新著《中古都城建城傳說與政治文化》的思路，都城的選址與營造、佈局與區隔，同樣是不容忽視的權力象徵，成為王朝建構政權與正統性的重要資源。探討帝都營造對經典著作的承繼與發明，或城市空間與國家禮儀之間關係的中古城市論述，學界已有豐碩成績，亦不乏傑作，妹尾達彥〈都城與王權禮儀〉一文，對此有詳細的回顧與介紹。¹鑒此，本書作者另闢蹊徑，試圖發現中古都城建制系譜中「禮制之外」的元素，(頁 31)致力探究讖緯知識與傳說故事在中古都城營建史中的作用，以及其中交織的政治實踐和話語競爭。如此敘事中的中古都城，不僅為政治文化提供空間，其本身便是政治文化的重要部分，成為王朝意識形態建設中不容忽視的關鍵因素。

* 廣州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副研究員

¹ 妹尾達彥，〈都城與王權禮儀——根據中國歷代都城復原圖〉，收入黃寬重主編，《基調與變奏——七至二十世紀的中國》(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等出版，2008)，第 1 冊，頁 71-99。

王靜長久以來關注中國中古城市史的研究，尤其潛心於唐代長安的耕耘。其城市史研究兼顧「小佈局」和「大佈局」兩方面。前者致力於闡發城市內部空間，例如由大明宮的空間佈局和政治運作，揭示晚唐宦官權盛的客觀條件，²對敦煌質庫帳的解讀，則反映長安新昌坊空間景觀和社會風貌的變遷，³這些研究顯示出作者對長安城內部空間的微觀與細讀；後者則表現在將終南山與長安社會聯繫一起，展現城邑內外互動背後鮮活的歷史圖景。⁴在此研究中，城市空間不再以歷史發展的結果而得到靜態說明與呈現，轉而成為歷史變化過程中的重要參與力量。換言之，都城中人在改造空間景觀的同時，空間景觀的文化意象也反過來制約人們的觀念和想像。作者沿此思路深入，進一步認為，一座都城的誕生，實是政治、歷史與知識的實踐過程，而非結果。不僅僅是簡單的選址、設計、修建到最終落成，還牽連著悠久而龐大的政治協商和權力競爭，值得深入分析。

歷代都城選址與營建理念，即「居中建極」原則的一致性，自不待言，然而作者更看重的是歷史發展的本相，即「一致」中的斷裂與差異。因此，本書不僅強調中古都城建設實踐中對傳統話語的反覆再現，更深入追究了實踐者對傳統話語的「再發明」。後者透露的正是時人的觀念與感受，既包括知識精英的文化建構，也包括普羅民眾的接受傳播，反映特定時代場域中實踐者的關心、焦慮、緊張以及因應方式，於是，一部都城的營建史，成為人們競爭政治資源和話語權力的歷史。

2 王靜，〈唐大明宮內侍省及內使諸司的位置與宦官專權〉，《燕京學報》，16(北京，2003)，頁 89-116。

3 王靜，〈唐代長安新昌坊的變遷——長安社會史研究之一〉，《唐研究》，7(北京，2001)，頁 229-248。

4 王靜，〈終南山與唐代長安社會〉，《唐研究》，9(北京，2003)，頁 129-168。

就禮儀制度而言，都城應是天下中心所在，是天然而唯一的，所謂「惟受命之王乃立國城於地之中」，統治者必須確認並證明自己佔據此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宣稱自身統治的合理性與合法性。早期關於都城選址的案例為周公陽城測影，最終營建洛邑。洛陽一地由此不僅成為地理意義的「地中」，而且還是政治意義的「地中」。然而，隨著王朝更迭、政治分合的時局演化，對於無法建都洛邑的王朝而言，勢必要製造新的政治「地中」以昭示天下。於是，圍繞都城的選址、營建、佈局與修繕，形成一系列「合理性」的敘事。這些敘事細節雖然充滿差異，但內在結構和主旨思想卻相當一致，即君主當「居中建極」，此觀念成為一種至高的價值觀和思想威權，賦予當權者天然的政權合理性，同時試圖剝奪其他人擁有至高權力的機會和資格。

作者擇取東魏鄴城、六朝建康、隋大興城與洛陽城和北宋開封為個案，具體分析都城營建的時代背景、政治意圖和設計理念，並將之與中國上古形成的「地中」、「測影」、「象天」、「法地」等政治文化資源密切聯繫，分析王朝對自身合法性與意識形態的建構，以及在此過程中對傳統思想資源有意識地借用、裁剪、誤讀與闡釋。

本書依照歷史發展先後次序進行章節安排，但歷時性卻非其研究特色，毋寧說，作者更關心的是，作為政治事件的遷都、建都與改造背後特定的時代場景、語境與現實。因此，在本書中，雖然每座城市都與其先前的帝都文化建築傳統有著千絲萬縷的承繼關係，但「嬗變」似乎更為重要：鄴城的再造是東魏建國的序曲，建康城的規度與孫吳、東晉乃至南梁的政權建設密切相關，大興城凝結著隋文帝(541-604, 581-604 在位)強大的權力意志，隋洛陽城是隋煬帝(569-618, 604-618 在位)大業的關鍵步驟，而北宋開封城的選址與佈局則是後周世宗(921-959, 954-959 在位)、北宋太祖(927-976, 960-976 在位)時代宣稱自身正統與營造合法性的重要手段。看得出來，作者並不僅僅將都城放在中國都城史的序列裡

進行歷史爬梳，而是將每一座都城看作王朝建立與建設實踐中獨一無二的政治產物進行具體探討，這似乎無形中與西方學界「由以『中國』為中心到『朝代』為中心的城市研究」的趨向互相呼應。⁵

將都城營建的契機與過程作為研究對象，除了詳細考察特定的政治背景外，還需具體分析參與者，因此我們通常能在其中看到至少三位關鍵人物，即皇帝本人、策劃者(負責製造政治輿論)和施行者(負責都城工程營建)。在〈「築城得龜」與東魏建國〉一章中，東魏高歡(456-547)，擅長圖緯、風角、天文、占卜的儒士李業興(484-549)，和具體營構者高隆之就構成這樣的三位一體，不僅使鄴城的新址與再造得與「河出圖，洛出書」(龍馬負圖出於河，玄龜背書出於洛)神權天授的經典聯繫，(頁37)更在佈局營建中貫徹「憲章前代，模寫洛京」的理念。由此，《鄴中記》中關於鄴城「築城得龜，鹹以龜象」的簡單一句話，便有了豐富的意蘊，昭示著東魏統治者和知識精英在政權初建伊始精心的法統運思和構建。〈從「東南有天子氣」論六朝都城〉則檢討從秦代就開始盛傳的「東南有天子氣」之讖的歷史流變，這句話一方面被秦始皇作為穿鑿、改造江南風水的依據；另一方面則被孫吳以來的南方政權創造性地一再利用，這些在地統治者不僅藉地理形勢之利，追摹洛陽的山水地貌，並透過天闕、里閭、宮室、園林等具體構造實現與西漢長安、東漢洛陽乃至曹魏鄴都與洛陽城的一致性，(頁57)進而試圖營造中原正朔的政治身份。而崇信佛教的梁武帝(464-549, 502-549在位)，更利用古代印度宇宙模式新蓋天說，重新修繕建康宮，這與當時改革時刻制度、長春殿講義、建造同泰寺等舉措實乃同一思路，即利用佛教傳入的天文學新知，將都城建康及其建康宮營造成宇宙的中心。(頁73)

⁵ 參見費絲言(Si-yen Fei)，〈明清的城市空間與城市化研究〉，收入邱仲麟主編，《中國史新論——生活與文化分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3)，頁 317-341。

由於陳寅恪(1890-1969)的闡發，我們已然熟知宇文愷(555-612)、閻毗(564-613)等西域血統的巧思工匠在興建隋大興城中所發揮的關鍵作用，本書〈大興城與楊隋代周〉一章，則進一步將大興城的營建鑲嵌於周隋之際的特定歷史語境中，考察附於建築巧思背後的政治理念。因此，「雅信符命、深信術數」的隋文帝及其周圍精通陰陽卜祝人士，便成為大興城營建史背後看不見的手。高穎(541-607)、劉龍等人負責規劃典章禮儀，宇文愷則負責營造工程，最終拔地而起的大興城，巧妙履踐經典禮制的同時，更以「乾卦之象」完美宣稱隋文帝的天命所在。隋洛陽城同樣如此，雖史籍清楚記載該城也出自宇文愷之手，但〈洛陽城與煬帝大業〉一章不滿足於此，透過史籍鉤沉聯綴，揭示隋煬帝、尚書令楊素(544-606)、術士章仇太翼及宇文愷的多人共謀，不僅透過營建洛陽城實現對「地中」的回歸，更以中軸線、宮殿群的設計，營建出完美的人間版「太極宸宮」，(頁113-123)由此試圖昭示隋煬帝空前的帝王偉業。

後周、北宋定都開封可謂空前絕後的舉動，自是值得細縷深究的話題。從縱向歷史大勢來看，安史之亂後，洛陽城遭到嚴重破壞，唐朝統治者無意(也無力)復興這座城市的政治意義，同時，自中唐開始，中國的經濟重心開始向東南轉移，汴河和汴梁的政經戰略地位大幅提升，成為以武力、財力號召天下的重要根據地，這正是後周和北宋(不得不)定都開封的歷史背景。在此實踐過程中，後周世宗和宋太祖是至關重要的角色。無論是後周世宗模仿西周「陽城測影」之舉，(頁130-140)還是宋太祖依照五音姓利改造開封宮城，(頁153-166)並施行特定的南北向規劃理念以實現「臥牛禦龍」的城市景觀，(頁167-175)其背後一以貫之的意志在於透過都城營建昭示政權合法性和神聖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將開封的營修過程與後周世宗朝頒佈的《欽天曆》、(頁136)宋太祖朝開始編修的《地理新書》放在一起討論，(頁138)讓我們看

到空間佈局與知識生產在權力展演過程中的相互借力與助力。

由於本書以個案論文的形式呈現，且著重於「建城」一事，因而章節之間在論述思路上存在些許偏差。例如第一章(東魏鄴城)、第三章(隋大興城)，研究視角基本上固定於新朝建立的啟始點，透過考察都城建設與讖緯傳說互動下的人為實踐(觀念發明和城市設計)，將特定的時間點延展成具有「過程」的時空圖景。尤其是東魏鄴城，此前對於北朝的論述，多集中於北魏、北周、隋唐這條序列，對東魏、北齊的論述本就相對弱，而東魏尤其。本書以高歡營建鄴城入手剖析這段政治史確實饒有新意，以「築城得龜」解釋鄴城的空間規制有其道理，但作者以相當長的篇幅將此事與上古大禹治洛相嫁接，(頁36-37)此中缺乏直接的證據，有臆斷之嫌，還需再考量。

第二章(六朝建康城)、第四章(隋洛陽城)和第五章(北宋開封城)則涉及多位當權者的遞嬗，導致論述焦點不夠集中。第二章核心議題是南方統治者利用「東南有天子氣」此一流傳已久的故事，在三國吳孫權(182-252, 229-252在位)、東晉成帝(321-342, 325-342在位)以及梁武帝對建康這座城市的反覆改建中，我們看到了同一城市空間的時間疊層。這事實上也間接說明本書未直言但卻始終贊成的觀點，即中國中古都城的建設固然有法祖經典、追慕古制的一面，但這只是表象，都城總是反映著「現在」的意志，傳統並不能挑戰當下價值。第五章討論隋煬帝營建洛陽城的契機和規劃，但作者卻在文中稍顯突兀地插入武則天(624-705)營造天樞的事件，稱是武則天「利用佛學宇宙觀進一步強化洛陽『天下之中』的意象……顯然是延續了隋煬帝對洛陽宮城、皇城的規劃意圖」。(頁122)由於第二章對建康城營建做了序列式論述，因此這樣的描述似乎並無不可。但必須強調的是，武則天革唐為周，將東都更名為神都，大力借用佛教作為政治宣傳，但又不止佛教，武則天同時也非常倚重《周禮》。因此，「天樞」既是佛教宇宙觀中的「地中」，

同時也呼應中原傳統文化觀念中的「地中」，武則天欲藉此確立自己在歷史長河中的神聖位置，然而武則天「神都」時代的變更遠不僅於此，需要更多篇幅專門分析，作者似乎沒有必要在此添足。當然，此問題正源於本書的最大缺憾，即唐代都城的完全空缺。

本書分別論述隋代大興城與洛陽城，認為隋文帝大興城襲自北魏洛陽城，而隋煬帝洛陽城則模仿西安長安城，指出隋代「將復古制」，即行「漢魏之制」，進而由此發問，兩城的建設是否便是此思路下的兩大舉措？(頁125)作者認為並非如此，洛陽城的建設與煬帝的個性和政治傾向密切相關。本文認同此論斷，但對於該問題的思路有不同意見。因為，「漢魏之制」中的「魏」是「曹魏」而非「北魏」，陳寅恪曾言：

凡江左承襲漢、魏、西晉之禮樂政刑典章文物，自東晉至南齊其間所發展變遷，而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孫模仿採用，傳至北齊成一大結集者是也。其在舊史往往以「漢魏」制度目之，實則其流變所及，不止限於漢魏，而東晉南朝前半期俱包括在內。⁶

因此大興城和洛陽城雖同屬隋朝的兩座都城，實際上卻透露出歷史在同一朝代、兩位皇帝之間的斷裂，隋文帝和隋煬帝的政治追求和文化旨趣截然有別，因此，他們對「古制」與「現政」的理解也迥然不同。此處不妨借用陳寅恪「關中本位政策」一語，如果隋文帝還固守這一本位的話，隋煬帝便試圖改變了，我們可以在本書所引文獻中看到這樣的企圖，例如〈營東都詔〉中所謂：「南服遐遠，東夏殷大，因機順動，今也其時。」(頁107)例如〈營東都成大赦詔〉中提到：「營建東京，震懾諸夏……東西巡撫，朝覲惟宜。」(頁124)以及大業三年(607)四

⁶ 陳寅恪，《陳寅恪集·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敘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頁3-4。

月庚辰發佈的詔書：「古者帝王觀風問俗，皆所以憂勤兆庶，安集遐荒。自蕃夷內附，未遑親撫，山東經亂，須加存恤。今欲安輯河北，巡省趙魏。」(頁127)本書重點在建城傳說，因此並未多加重視這些訊息，然而，必須強調的是，隋煬帝這些措辭是東漢崩解三百餘年以來所未聞的，因此書中對於洛陽城宮城結構精心安排的論述格外重視，即煬帝洛陽城對秦都咸陽和西漢長安的追慕，但僅說西漢長安也不夠嚴謹，因為「多宮制」的形成更確切而言是漢武帝(156-87 B.C., 141-87 B.C. 在位)時代的產物，⁷於是，我們從這座城市的營建中，可以窺見隋煬帝如何將自身鑲嵌入更加宏闊的歷史長河中，以及其隱祕的自我身份定位。史睿〈北周後期至唐初禮制的變遷與學術文化的統一〉一文，論述了歷史走向在文帝和煬帝二者間的斷裂與差異。⁸此論斷對於我們認識隋朝直至唐前期(玄宗朝之前)這段歷史的曲折發展很有意義，歷史固然是永不止步的時間機器，然而人類歷史的切斷與接續，並非總是呈現單向的直線性，此點也有助於我們在考察同為隋代的兩座都城時，做出更為切近的判斷。

即便唐代缺席，但本書內在邏輯仍一以貫之。透過對中古五座都城的格局分析與建城敘事，作者揭示出都城背後「人格化」(甚至「神格化」)的深刻內涵與具體意蘊。由此，本書不僅將都城史還原為都城(人為)營建史，更將大量讖緯、謠言、傳說等「邊緣」文獻，納入建城這一通常被認為追慕傳統、合乎典範的禮儀實踐中，做了更為豐富而複雜的探討。在闡發政治文化和歷史背景的同時，作者將中國古代都城

7 巫鴻著，〈紀念碑式城市——長安〉，收入巫鴻著，李清泉、鄭岩等譯，《中國古代藝術與建築中的「紀念碑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頁 216-231。

8 史睿，〈北周後期至唐初禮制的變遷與學術文化的統一〉，《唐研究》，3(北京，1997)，頁 165-184。

建設中的諸多元素進行符號化的處理，如「居中建極」、「南北中軸線」、「宮前東西大道」、「市場規劃」、「左祖右社」、「單/多宮殿」、「里坊制」、「里閭制」等，每個符號都內蘊特定的象徵意味和政治涵義，不同都城對此的揚棄、改造、重組、模仿與再現，實際上反映統治者塑造政權合法性的創造性實踐，與特定意圖密切相關的同時，不僅借助經典學說，更迎合廣為人知的圖讖觀念。這樣的實踐不僅發生於中古時期都城，後世的北京城、南京城等亦如此。⁹

1963年出土於陝西寶雞陳倉區賈村鎮的西周青銅禮器「何尊」，據說出自一位何姓貴族之手，其上銘文記述成王繼承武王遺志，營建東都洛邑之事，而銘文中的「宅茲中國」四字則成為「中國」一詞最早的文字記錄，意思是「王之所居，乃天下中心」。這一觀念此後演化為一股強大的精神傳統，成為歷代稱帝者無法擺脫的觀念慣性，所有關於都城的實踐都以此為中心，每一次的具體實踐特色各異，但不變的是，統治者對「地中」理想的追求，即試圖透過都城建立實現權力，進而左右人們的思想與行為，此追求與實踐過程洩露了權力者心中的政治欲望與緊張情緒。這些身之為人的鮮活感情，往往消失於後世刻板、枯燥、破碎的文獻敘述中，這一點即明顯體現於北宋宋敏求(1019-1079)《長安志》對唐代韋述(?-757)《兩京新記》的刪減。¹⁰基於此，本書雖尚有進一步擴充的餘地，但已經做出可貴的嘗試和示範。如果打破現代學術分科以來的成見，即地理學、天文學、城市建設、

⁹ 參見陳學霖，《劉伯溫與哪吒城——北京建城的傳說》(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另可參見費絲言對謠諺與明代南京文化建構過程之間關係的發覆，見 Si-yen Fei, *Negotiating Urban Space, Urbanization and Late Ming Nanji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¹⁰ 榮新江，〈關於隋唐長安研究的幾點思考〉，《唐研究》，9(北京，2003)，頁 1-8。

思想史、政治史、制度史、考古學等之間的條框，儘可能在性質多元的文獻之間勾連補綴，我們將可能復原每一座古都建設之初的歷史場景，其中滲透著統治者、知識精英、建築師的合力，政權、制度、宗教、禮儀與宗教的交織，乃至官方禮儀與民間傳說的互動。如此角力下的都城，通過可視的景觀，將顯而易見的壓制權力轉化為隱而不彰的震懾機制。

(本文於 2014 年 2 月 21 日收稿，2014 年 6 月 3 日通過刊登)